

她们这样与白血病抗争——

# 妹妹供血13年，姐妹俩变成同一血型

特约记者 安静

她们是一对患难姐妹。2001年，姐姐被确诊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。此后13年，姐姐每次癌症复发，妹妹就为姐姐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，先后十数次把姐姐从死神手里夺回来。十多年后，姐姐的血型从最初的AB型血转变为妹妹的O型血，性格也渐渐变得和妹妹一样……

## 姐姐患白血病，妹妹捐造血干细胞

5月16日，记者在北京见到柏慧时，她正准备进行新一轮新的免疫治疗。这名与死神斗争了多年的女性，精神良好，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带癌生存了13年的病人。“这要感谢我的妹妹，她是个伟大的人。”这13年里，她已经第10次为姐姐躺上捐献床。

13年前的2001年6月，在南京鼓楼区天正桃源小区内，柏慧家正在召开一场家庭会议，柏慧的父母和妹妹柏翠云一家全都到场，现场气氛格外凝重，大家都愁眉不展。

“医生说，我的病情不太乐观。”柏慧沮丧地说。

“大姐，你别怕，明天我和弟弟去做配型。”柏翠云安慰姐姐。

柏慧泪如泉涌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还不到40岁的自己，居然会得上白血病。柏慧一难过，全家都跟

## 全新癌症疗法，姐姐变成妹妹的血型

2009年9月底，柏翠云给姐姐洗澡，无意间发现姐姐胸部和腋下鼓起了小包，她想起医生的话，心里一阵颤抖。第二天，她执意带姐姐去了北京的医院，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：姐姐的白血病复发了！

柏翠云第一时间想到的，就是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救姐姐，可医生的话却浇了她一头凉水。原来造血干细胞移植过一次后，再移植就没用了。迫于无奈，柏慧只能接受放疗。

三个多月的治疗结束了，柏慧的病情总算控制住了。可回家不过一个星期，她的病情突然恶化。来势汹汹的癌细胞侵入骨髓，白血病全面复发，周身癌细胞达86%，免疫细胞在体内根本无法生长，再加上高烧不退，竟发展成败血症。这似乎宣判了柏慧死刑！

柏慧绝望了，她求丈夫把自己带回家，她不想死在异地，不想死在冷冰冰的医院里。丈夫哭着对医生说妻子的请求，希望能把妻子带回家，柏翠云呵斥姐夫：“哭什么

## 姐姐：我拖累你了！妹妹：用这点血换姐姐很值

2013年4月，原本应该去医院做例行检查的柏慧说什么也不愿动身，她知道每去一次医院，就等于要抽一次妹妹的血，不论大家怎么劝说，她坚决不松口。一个月后，柏慧的上身鼓起了一个小包，她自然知道这是个什么征兆，但她没告诉任何人。柏翠云知道姐姐闹情绪是在自责，她安慰姐姐说，抽血一点都不疼，可姐姐并不相信。

晚上，柏翠云端着一杯牛奶来到姐姐房间，发现姐姐脸色惨白，急忙问：“姐，你没事吧？明天咱去医院看看。”柏慧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没事，我挺好的。”

柏慧的神情哪能瞒住柏翠云，她一把掀起姐姐的衣服，发现了姐姐身上那个小包，她急了：“姐，你

着掉泪，唯有柏翠云没哭：“姐，哭有什么用？你放心，只要配型成功，你要啥就从我身上拿啥！”

很快，妹妹和弟弟的配型结果出来了，妹妹和柏慧配型成功！得到这个消息，全家如释重负，可柏慧却有些为妹妹担心。妹妹家的条件很差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要是她身体垮了，她的家也就完了。

姐姐的顾虑，柏翠云没在意。她想，既然自己和姐姐配型成功，救姐姐责无旁贷。

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，经过一系列检查测试，柏翠云将给姐姐捐献造血干细胞。和以往直接从骨髓内提取细胞的方式不同，医院决定为柏翠云注射刺激因子，刺激因子会像小扫把一样，把骨髓里造血干细胞“扫”到外周血中，医生可直接从手臂抽血，然后再通过分离器

哭，能治还得治！现在回去就是送死。”在柏翠云的一再坚持下，柏慧最终同意继续治疗。

晚上，在出租屋的洗手间里，柏翠云独自哭了很久。这一次，她彻底没了主意，她的脑海过电影般地闪过所有和姐姐在一起的镜头。姐姐站在凳子上给她和弟弟做饭，姐姐给自己编小辫，姐姐和自己约定，以后即使结婚了，也要住在一起。那个像小妈妈一样陪伴自己长大的姐姐若真的不在了，她该怎么办？

针对柏慧的情况，医生们经过彻夜讨论，终于制定出了医疗方案，这是一种全新的癌症治疗办法——免疫疗法。这种治疗办法主要依靠树突状细胞，它可以分泌很多细胞因子，促进体内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的免疫功能，一旦“坏细胞”出现，能立即找到并进行分解清除。这种细胞主要分布于淋巴结等部位，免疫治疗就是将它提取后，制作成“细胞炸弹”，再注射回病人体内。

能救柏慧性命的淋巴细胞，当然还是要从柏翠云体内提取。听说

犯病了，为什么不不说？”

柏慧的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：“姐不能再抽你的血了，你看你现在的。”

柏翠云腾地站起身：“你是不是病傻了？我瘦点能比你的命重要？”

柏慧只一个劲儿地哭：“姐拖累你了。”

“姐，我哭过了。”柏翠云抱着姐姐说。柏慧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妹妹，有些错愕。从懂事起，柏慧就没怎么见她哭过。自从自己生病后，亲戚朋友全都为她哭过，唯独妹妹不曾掉过一滴眼泪。她好奇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哭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柏翠云说：“你病情最严重的那次，你跟姐夫说你快不行了，说你想回家，那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你

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。这种方式听起来没有骨髓移植痛苦，但刺激因子“扫”细胞的过程并不好受。

连着打了一个星期的刺激因子，柏翠云体内的造血干细胞数量终于达标。第一天，医生从她身上抽血，时长达5个小时。抽完血，她只觉得头晕眼花，四肢发麻。费力爬起来，都感觉不到自己的胳膊腿在哪儿了。

第二天同样是5个小时，下了病床，柏翠云哆哆嗦嗦地往姐姐所在的无菌病房挪。护士要求她回病房休息，可她为了能让姐姐安心，坚持挪到病房让姐姐看自己一眼。

持续两天共计10余个小时的细胞抽取，使得柏翠云的身体虚弱不堪。但休息了不到一天，她就和匆匆赶到北京的姐夫交了班，赶回家照顾丈夫和孩子。当年春节前夕，逐渐痊愈的柏慧也回到南京。

姐姐有救时，柏翠云心甘情愿地爬上了捐献床。

整整9个月的治疗期，柏翠云就像个巨型血袋一直守在姐姐身边，只要姐姐体内细胞异常，她就源源不断地给姐姐贡献免疫细胞。终于，柏翠云将姐姐从病魔手中夺了回来，而柏慧的血型也由最初的AB型变成妹妹的O型血。家人甚至发觉，柏慧的性格，变得越来越像妹妹了。

手术后，医生告诉姐妹俩，这种治疗方法要求捐献者随时能给患者捐献细胞。通常情况下只要患者身体出现不适，就需要从捐献者体内提取血液细胞。也就是说，此后姐姐的生命完全寄托在妹妹身上，妹妹是姐姐活下去的唯一保障。

对此，柏翠云欣然接受，可柏慧心中却充满了负疚感。她觉得自己活着妹妹就得跟着受罪。治疗到现在，没有人可以告诉她，到底要抽妹妹多少血，才能治好她的病。看到妹妹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，柏慧心如刀绞，想要自生自灭的想法日益根深蒂固。

出不来了，我就开始胡思乱想，想我们姐弟三个小时候的事。仔细想想，咱们姐弟三个，真没怎么分开过。你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谁比我们更亲。你要是不在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她抬起袖子，继续说，“不就抽个血吗，用这点血换个姐姐，我觉得值！”

柏慧叹了口气，眼泪在眼眶打转：“姐听你的，姐去医院。”

2014年5月，柏翠云带着姐姐再一次来到北京。

目前，柏慧还在北京接受治疗，柏翠云会一直陪在姐姐身边。柏慧说，她希望身体复原后，带妹妹去全国各地旅游。

(本文不得转载、上网、摘编)

# 一个男人对性别平等的追问

——专访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高级官员马雷军

- 一些有性别歧视的电视广告因他而改变
- 他提出：为什么灾难中女性受害者远高于男性
- 他建言：灾难救援中应该出现女性急救包
- 他说：女性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保护而是平等的机会

文：今日女报/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

## 他用“性别平等”说服明星们修改广告

工作劳累了一天的杨澜，回家准备刷牙的时候，旁边突然出现一个年轻的男医学专家，并建议用高露洁品牌牙膏。——这个画面，你或许很熟悉，是杨澜曾为高露洁牙膏做的一个广告。

但现在，如果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，这个广告有了一定的改变：工作劳累了一天的杨澜，回家刷牙的时候，身边的男医学专家不见了，杨澜自己掏出牙膏说，“用高露洁牙膏吧”。

这个广告的改变，因为一个男人——马雷军，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。

5月29日，在全国妇联举办的社会性别平等与媒体研修班上，马雷军用一个个生动的广告画面阐述性别平等：“我们都知道，杨澜是个名人。第一个广告，杨澜在用牙膏上的选择，听从医学专家的建议没有错，但是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年轻的男士。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看来，男士讲的话，权威性是比较高的。这就体现了性别的平等。”

第二个广告画面之所以没有了医学专家的画面，是因为杨澜和她的团队在听了马雷军关于“社会性别平等”讲座后，杨澜和其团队才改变的。马雷军说，这一点改变，非常不容易，不过，让马雷军有些遗憾的是，广告的背景声音，还是“男音”。因为广告商最后还是认为：“男音比女音更加权威一些。”

类似的存在性别不平等的广告，在马雷军看来比比皆是。明星海清的一段关于某食品的广告，在马雷军看来更是把女性传统印象刻画到了极致，广告的内容是：海清辛苦拍戏回来，家里的丈夫和儿子宁愿饿着也要等在外面工作的她回来做饭，儿子看到她进门便说“我们快饿死了”，而听到此话的海清是一脸的愧色。“哪里规定说，女人天生就是为男人洗衣做饭的呢？我也跟海清提出过她不应该展现出女性传统的这一‘刻板形象’。海清接受了我的建议，她的团队也在改。”马雷军说，类似的广告因此而改变的还很多。

## 为什么自然灾害中女性受害者远高于男性

“性别=男性+女性，这两性关系，就是一个平等。”马雷军在接受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专访时，用缓和却笃定的语调说这句话。不过，现实生活中，“我们做的非常不够”。

联合国和伦敦经济学院就2008年前的所有自然灾害做了一个调研，发现灾害中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普遍达到1:4。这意味着，灾害中每死亡1名男性，同时就有4名女性死亡，汶川地震，也基本符合这一比率。究其原因，马雷军解释：一开始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是体格、力气、肺活量等生理差异导致如此。然而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调查却发现：不是生理原因，而是4个社会因素导致了女性极高的死亡率。“许多男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爬树、游泳；女孩则被教育要矜持。加上自然灾害中75%到80%的死亡都发生在屋里，而男主外、女主内的性别文化中，女性呆在家的时间本来就多，又不像男性，一有风吹草动提个大裤衩就能往屋外跑。”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，优先得到父母救命相救，救灾时获得更多物资的，几乎都是男孩。即便在日常，男性也总是能比女性更多地获取灾害信息。

“有一次，我们在乡镇组织防灾培训，一名受访妇女说5次培训里她只参加了半次。前4次都是丈夫去的，第五次丈夫不在，她去了，培训10点才开始，11点就要回家做饭，半次培训成为了她全部的防灾培训过程。”这意味着，仅仅是在日常防灾培训里注意提高女性的参与度，就可以大大减少灾害中的死亡率。”马雷军说。

汶川地震发生后，作为联合国妇女署的官员，马雷军多次去灾区调研，“我发现，在灾区准备的急救包中，很少有女性急救用品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社会性别上对女性欠考虑。”为此，马雷军在给四川做“灾害中的社会性别问题”讲座时，专门提到，“现在他们做的很好了，比如说，急救包中出现了卫生巾等女性用品。”

(下转 A05 版)



查询·订票·送票·常客服务